

全椒縣志

送
审
稿
之
八

人
物
分
册

安徽省全椒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集

全 椒 县 志

(人 物 分 册)

安徽全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第八编 人物	(1)
第一章 人物传	(1)
第一节 政界	(1)
第二节 军界	(11)
第三节 文化界	(21)
第四节 英雄模范	(36)
第五节 其他	(39)
第二章 人物表	(43)
第一节 政界	(43)
第二节 军界	(49)
第三节 文化界	(54)
第四节 模范	(64)
第五节 革命烈士	(66)
附 录	(74)
一、 旧县志纂修始末	(74)
二、 旧县志序文选	(75)
后 记	(79)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81)
编纂成员	(82)

第八编 人物

第一章 人物传

第一节 政 界

张 洎

张洎（934—997），字师黯、偕仁，全椒草庵沿村河人（今名）。他行止洒脱文采清丽，博览佛道书籍，性格怪癖好揭人短。父亲张煦曾任南唐滁州法曹，张洎本人中南唐进士，从后主李煜，官礼部员外郎、知制诰，起草诏书，参予机密，深得后主信任。后任中书舍人，拜清辉殿大学士。

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太祖赵匡胤灭南唐，张洎从后主作阶下囚。金陵被围时，张洎曾劝李煜拒降，并起草蜡书调遣救兵，因之，被捕后宋太祖责问张洎，并取出缴获的蜡书为证。张洎毫无惧怕，从容地回答说：“各为其主，今能一死，尽为臣之份了。”张由此而受太祖器重，授官太子中允，入舍人院。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张洎受太宗赵匡义之命，先后出任相、贝两州（相州，今河北邢台，河南林县一带；贝州，今河北，山东交界数县）太守，数年后回京任礼部郎中。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张洎出任太仆少卿，太宗召见他说：“以往，太仆少卿乃是闲职，今我赋其为要职，你即是改制后的首任，今后，是凡章奏必经你手后呈递给朕。”不久，又被拜为谏议大夫、大理寺判兼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一时深得信任，太宗曾赐诗称赞他为“江东人士之冠”。端拱初年，契丹入侵，张洎上表建议练兵聚谷，分屯军队于边塞。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赵匡义任命张洎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寇准同列中书；因政事为寇准主持，乃专修政纪、编纂史籍。翌年赐给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清河郡开国侯。张洎因身为二臣，议事一向迎合太宗意旨，后被太宗察觉，降参知政事为刑部侍郎，十余日后病逝于京，终年六十四岁，死后追赠刑部尚书。

张洎有文集五十卷流传于世，其中《贾氏谈录》是其为南唐使宋时所记录的贾黄中谈话录，内容多为唐代轶闻。

吴 玠

吴玠，字璞生，全椒人。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拔贡，他年青时苦读兵书，

精通书法，朝考后被选任湖北光化县知县。到任后，积案数十件，一月间全部审理清楚。吴璥屡任外员，经常调动，不论在巴东（今四川东南部）、江夏（今湖北东部）还是在广济，每到一地，必兴修水利造福于民。

一年，广济遇大旱，调吴璥至广济，吴发放巨款维修护城河，并架设桥梁，赈济饥民。广济州原设抚卹、堤工两局，局员贪脏枉法侵吞救灾、水利款金。吴璥惩的惩、罚的罚，然后，征集河工修复广济渠大堤。大堤合拢时突遇狂风暴雨，堤坝危险，吴璥急令民工用芦柴和泥堵塞决口，但风浪太大，投去的芦泥全被激流卷走，危急之际，吴璥奋身跳入决口，手下官员哭喊救命，众河工为之感奋，遂一起跳入决口塞流，大堤终于筑成，因功，升沔阳知州。

吴璥卒年无考，死因镇压苗民李元霸起义，昼夜随军，旧病突发，吐血而亡。

薛 春 黎

薛春黎（1813—？），字淮生，一字稚农，祖居桑根山（今复兴乡境），自幼读书刻苦。咸丰壬子（公元1852年），年四十乡试夺魁，第二年与弟薛时雨同中癸丑进士，于庶常馆就读，假期曾返回全椒拼凑地主武装与太平军作战。后结业散馆，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庚申（公元1860年）改任湖广道监察御史，转任山东道巡视西城，山东道台等职。

薛春黎常恨没能穷究经世之学，因之，取历代政书、典籍悉心钻研，以参考兴亡得失。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各地农民纷纷组织武装配合太平军作战。薛春黎上书献策主张离间农民武装与太平军之间的关系，以便各个击破，咸丰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庚申秋，七月，英国军队侵犯天津，薛春黎呈递奏章劝咸丰早定战守之策。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后，怡和、肃顺等人劝咸丰以“秋猎”为名避居热河，薛春黎会同诸大臣联名上书，以畏敌罪弹劾怡和等人，谏阻咸丰前往“避暑山庄”而留京组织抗敌。八月初七日晨，薛春黎得知咸丰即将登程，遂徒步入宫准备以死谏阻，行前，将家事托给他人，至宫门方知咸丰早已出京，痛哭而返。不久，咸丰在热河任命四大臣负责北京五城防务，十御使兼任副职，薛春黎也在其列。他夜晚清理积案，白日指挥士兵操练战法，不时登城巡查。咸丰驾崩，懿贵妃杀肃顺等八大臣篡政，因薛春黎曾奏请诛杀肃顺等人，被晋升四品衔，巡视通州漕务；到任后，薛改革漕规，革除积弊，仓库充实。

薛春黎办事干练果决，咸丰葬仪前，六部九卿大臣会议，从早到晚，终无定论，薛春黎三言两语，大臣们无不称是。

薛春黎晚年曾任京兆（治所今西安）主考、江西主考等职，终卒试院，著有《味经得隽斋诗文集》传世。

薛 时 雨

薛时雨（1818—1885），薛春黎胞弟，字慰农，号澍生，因祖居桑根山，晚年又号桑根老人。薛时雨幼时精读诗文，博览群书，治学不宗门户，比次兄薛春黎早九年中举。咸丰癸

丑（公元1853年）登进士第，授浙江嘉兴知县。上任后，恰遇大旱，百姓无粮纳税，薛时雨下令停征，上司催粮令屡下，他置若罔闻，被撤职罢官。浙江人都说：“清官者，首推薛嘉兴”。

太平军攻下浙江后，薛时雨担任李鸿章的幕僚，遇湘、淮两支地主武装斗角勾心，薛时雨为了封建王朝的最高利益竭力从中调停。驻守嘉兴的太平军某将领欲叛变投清正迟疑不决，薛时雨只身诱降了该部义军，使太平军受到了巨大损失。因对清廷有功，经左宗棠奏请，补授杭州知府掌浙江粮储道，并赏赐顶戴花翎。上任初，杭州刚从义军手中夺回，大战刚过百业凋敝，薛时雨为了尽快地为清军筹集粮饷，采取招集流亡，鼓励百姓复业的政策，经济有所恢复。他还建立东城讲学所，招文士授课于西湖，发展封建文化。省布政、按察二使外出，薛时雨代行两司事，每日公文堆有一尺多高，他均亲自审批，不求他人，因之同僚嫉妒暗中诋毁，被调任乡试主考。

去官后，在杭州“崇文书院”讲学三年，接着又主讲于江宁（今南京市及周围数县）“尊经书院”。有人议论他滥收弟子，他说：“培育人才不等于使用人才，用才宜严，育才宜宽”，闻者无不称是。由于他兴办教育有绩，浙江人和江宁人分别在杭州西湖和南京清凉山两地为他建造住宅，皆名“薛庐”；此外，嘉兴的“烟雨楼”、滁州的“醉翁亭”都曾收有他的画像。薛时雨主讲金陵时，经常往来于滁州琅琊古道，因仰慕欧阳修的学识人品，捐资重修“醉翁亭”，增建了亭馆四周的花墙，以及酿泉上的小桥，人称“薛老桥”；至今，门匾上“醉翁亭”三字仍为薛时雨的手迹。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薛时雨卒于南京，遗著有《藤香馆诗删存》、《西湖槽唱》、《江舟歇乃》词及《札记》。

邱 文 江

邱文江（1860—1911），字宗海，号晚香居士，祖籍福建龙岩，幼年随父经商迁居合肥，后定居全椒古河镇。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因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在古河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因事机不密，被清政府全椒知县邵正丙率兵镇压，与其子邱御鸣同时殉难。

邱文江自幼读书聪颖，二十岁弃学就工，入南京江南制造局学习机械制图，工作十余年，多有创新。后弃工务农，在全椒古河镇附近购置土地，起名“邱家花园”，兴垦农桑。他在农闲工余之暇常向农民宣传取消帝制，建立共和的民族民主思想；因之，受到地方封建士绅的仇视，难以存身，遂于光绪卅年（公元1903年）前后北走颖上、寿县，西至合肥交接王占一、张孟介、吴旸谷、范鸿仙、龚正鹏、王正藩等反清人士，约定分头进行活动，待机成熟，共举大事。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告捷，邱文江忽忽从和县返回邱家花园，召集同志王甲三等人共谋组织国民军响应武昌起义。他们决定先将滁（县）全（椒）两县光复，以切断张勋的归路，并利用邱与张勋部团长左金台有旧劝左起义。同时，组织民团敢死大队千余人，邱御鸣为前敌支队长，在封山寺集中开会，宣布起义计划和纪律。接着他们又秘密地向古河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募集了军款，遣人赴沪购置军火，赶制义旗、袖章。为了寻求配合，邱文江又派其次子邱砥青星夜驰往合肥与吴旸谷联系，其时吴已抵达安庆组织起义，乃

与合肥孙品三等人协商，孙等当面应允农历九月廿八日出兵古河相助起事。

九月底，由沪购运的军火因滁河干涸尚未运到，加之北方数县起义均因异军叛变而陆续失败，约好在十月起义的计划被迫延期。十月初，举义一事被全椒知县邵正丙获悉，遂带兵于古历十一月十一日夜包围了邱家花园，邱文江和邱御鸣不幸被捕，押至古河保甲局审讯，邱文江陈述民族大义，斥责邵残害百姓，助纣为桀的种种罪行，遂与子御鸣一起被处以斩刑；邱文江就义时五十二岁，子御鸣年仅十九岁。

邱 景 章

邱景章（1872—1920），字端甫，号苏斋生，世居全椒城内金家巷。邱九岁时父母早丧成了孤儿，十六岁入选廪生，十八岁中乡试二名举人，光绪甲辰（公元1904年）考中进士，历湖南嘉禾、宁乡、清泉等县知县（试署），后实授邵阳知县。

邱景章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步，他早年专攻《昭明文选》和五言古诗，成年后精研经史以礼为宗，认为正统儒学是拯救世风的良药。因之，与人胪列西周、秦汉时代的四十四位先儒事迹，准备增祀于孔庙中，请示督学没予批准。“甲午海战”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缔结，使邱景章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开始发觉先儒的经义无法拯救羸弱的国家，转而研究东、西方译著，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他拥护“康梁变法”，置清廷禁令不顾，在家乡创立社学以倡导改革，并提出“护民智，厚民生，伸民气”的治世之策。

“戊戌变法”失败后，同盟会成立，提出了“三民主义”政治主张，邱仍支持康、梁的立宪政治，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邱的思想依然未能转变。南北混战中，邱景章上万言书给南方各省十四都督，其文大意是：“革命在政治不在种族，共和虚君责任内阁，首图弭乱救亡。”虽然观点是保皇派的老调子，但他主观上主张一致对外，消除内战，挽救国家于危亡。

民国成立后，事实教育了邱景章，他转面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春天，安徽都督柏文蔚（国民党系）了解到邱景章在皖省的政治影响和行政能力，聘请他担任自己的政治顾问，邱因故没能赴任，同年出任全椒县首届参议会议长。为了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全椒各界一致要求把“奎光楼”改名为“国光楼”，邱景章书题楹联一副，悬于楼上，轰动一时，联曰：

“改革卯酉，统通丑寅；恨老天忒不仁，忍抛却四万万黄民，任南拉丁、西条顿、北海斯拉夫，伺隙争来；攘攘几家儿，腾踔中原，吁何劫运？”

尔雅方言，春秋朝报；愿吾党休自馁，好准备一双双赤手，算椒伍举、棠专诸、阜陵范亚夫，留芳未艾，区区百里境，诞育英杰，是我乡风！”

同年，邱景章出任全椒中学首任校长，他一生热心公益事业，设团防、发灾赈，不辞劳苦，曾参与重修光绪《全椒县志》。邱景章学识渊博，诗文不宗故常，气势汪洋恣肆；对《马氏绎史》多有考证。著作有《蹢窟诗文稿》、《蹢窟诗话》、《桑梓述记》及《从政随笔》等，部分为后人刊传。邱景章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夏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徐 赓

徐赓(1917—1940)，原名徐寿赓，字孝刘，曾用名吴则持，原籍江苏南京，后定居扬州，职员家庭出生。曾就读于南京安徽中学，扬州市立中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民国廿六年(公元1937年)9月，徐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至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春毕业，南下工作。先至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一三八师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秘密建立了中共一三八师政工队支部。民国廿八年(公元1939年)春，因国民党新桂系“反共”，徐赓按照命令，组织党员和进步军人秘密脱离了一三八师。10月，徐赓出任中共全椒县委书记，后因组织党员撤退，落入敌手，英勇牺牲。

民国廿八年(公元1939年)10月，中共苏皖省委为加强对白区以及对皖东桂系军队的统战工作，派刚从国民党一三八师撤出的徐赓担任中共全椒县委书记。徐赓受命后来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古河镇，以古河区动委会指导员的公开身份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古河镇当时是桂系统治皖东的政治中心，反共的大本营，徐赓到达后坚持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组织了青年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并在古河周围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此外，他还派党员渗入国民党《皖东日报》社，控制了总编和“地方版”编辑的重要职务，积极宣传抗日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了启发农民群众的斗争觉悟，徐赓通过基层党组织发动石溪乡八十户佃农至县城请愿，告发大地主张渭清违反减租减息、发放高利贷盘剥群众等十大罪状，在进步人士国民政府全椒县长朱遂的支持下，取得了实行“三七减租”斗争的胜利。事后，徐赓又建议在石溪街头树立石碑，并铭刻上八十个佃农的姓名以作纪念。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徐赓还组织在国民政府县区乡各级工作的地下党员，利用合法身份加强对国民政府区乡自卫队的争取工作，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赤镇、周岗两区自卫队三百余人枪加入新四军四支队与徐赓当时的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

民国廿九年(公元1940年)初，皖东国民党积极反共，为防止突然袭击，中共皖东路西省委决定组织古河地区地下党二百多名干部、党员有计划地撤离，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徐赓。徐赓接受任务后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大批党员、干部都是接到他的秘密通知后陆续安全地撤至周家岗、枣岭集地区。2月，撤退工作基本结束，为了对党和同志负责，徐赓决定重返古河检查撤离工作，但由于大批人员的撤离，已引起了古河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同志们再三劝阻，徐赓仍置个人安危不顾，毅然前往古河。当他完成任务经大墅街返回周家岗的途中，被国民党第十游击纵队谭萃宁部逮捕，秘密杀害于龙山脚下，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王 枫

王枫(1918—1942)，原名王传鼎，湖北沙市人，少时就读于沙市晴川中学，后因家贫辍学。在沙市时曾加入过“读书会”、“文学社”和“新生剧团”等青年进步团体，“七七”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民国廿五年(公元1936年)，王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英山工委组织部长、县委组织部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教导队指导员，中共无为县委书记等职，在湖北黄冈、英山等地从事党组织的建设和抗日动员工作。民国卅一年(公元1942年)，王枫在担任中共全椒县委书记期间，为开辟新四军二、七师交通线，在滁河溺水牺牲。

民国廿九年(公元1940年)5月，王枫被调到淮南津浦路任中共滁县县委组织部长，翌年5月出任全椒县委书记。当时，驻周家岗的县委处于敌伪顽三方的包围之中，斗争相当激烈。为了保卫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王枫带领战士白天翻山越岭了解敌情、清剿土匪，夜晚和战士们一起滚草草、睡地铺，从不讲困难。长期紧张艰苦的革命生活使王枫舍弃了个人的一切，他虽然已经结婚，但因工作需要，夫妻长期分居。当同志们提起他的个人生活，他回答说：“鬼子不打走，哪来的家啊！”民国卅年(公元1941年)夏，国民党军队准备向路西根据地进犯，王枫根据路西区委的指示，亲自到孤山察看地形，作好安排，为后来坚持孤山斗争打下了基础。10月，国民党桂系一七一师等部向路西根据地大举进犯，王枫带领县委机关转移到石沛桥以北山区坚持游击斗争，牵制了向藕塘中心区进犯的敌有生力量。

民国卅年(公元1941年)底，为了沟通新四军二、七两师的联系，王枫接受华中局和路西区委的指示，与副书记胡克诚一起负责开辟江全交通线。受命后，他们多次选派人员化妆，以石沛桥为起点到含山陶厂七师地区踏勘线路。民国卅一年(公元1942年)2月27日，王枫、胡克诚与新四军二师四旅加强排约定在大韩村会合，最后一次勘定线路。由于加强排途中遇敌延误了时间，到达官渡小罗村滁河边时东方已经发白，接应渡船撤走，大家只好借一干裂漏水的农用木盆渡河。王枫指挥人员登盆，边渡边舀浸入的河水，前几盆都安全地渡过了河。最后一盆，王枫、胡克诚和摆渡农民总计六人，由于负荷过重，渗水太多，木盆翻沉，其他五人均被抢救上岸，唯有王枫因不会泅水，加上身穿皮茄克、佩有手枪及子弹，身负过重沉入水底。经大家多次潜水抢救，未能找到，此时天已大亮，河岸上的日伪炮楼开始鸣枪，大家被迫含着悲痛离开了滁河，在胡克诚的带领下于次日到达陶厂，完成了交通线的开辟任务。路打通了，但王枫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第二夜，王枫的警卫员在河边找到了王枫的遗体，在乡亲的帮助下，将其掩埋于滁河大堤下。

建国后，1955年，人民政府将王枫烈士的忠骨检出入殓，以隆重的仪式在县城南屏山笔峰尖下为其莫立了碑墓，墓前还建立了纪念亭，以供全椒人民永远凭吊。

王 永

王永(1913—1943)，又名王尧璧，全椒南屏乡人，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民国卅二年（公元1943年）蒙冤病逝于陕甘宁边区医院，年仅三十岁。

王永于民国廿三年（公元1934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民国廿五年（公元1936年）毕业于省立凤阳师范。学生时代他品学兼优，爱读进步书刊，富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师范毕业后任教于全椒武家岗乡村简易小学，后经考试录用于南京中山门小学。民国廿六年（公元1937年），南京沦陷前，他离职还乡，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8月，与时生等人秘密前往延安求学。此时，王永已身患肺病，延安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全然不顾，学习刻苦努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第二年3月，王永从抗大毕业，分回皖东路西工作。回到全椒后，他与国民政府全椒县长王宗正取得了联系，被任命为全椒县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训股长，王永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深知要壮大革命力量必须把地方武装抓到党的手中，要抓到武装必须组建一支政工队伍。他根据在“抗大”学到的革命知识，与童苏群、何若人一道给抗日自卫军的大队、中队配备了“政训员”，並一律由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担任。政训股名义上属县政府领导，实际上是按照“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进行工作。这一时期，他们协助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壮大力量，在地方武装中发展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组织群众与恶霸势力和汉奸作斗争等，工作非常活跃，因之，王永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人们称他“二县长”。7月，王永去巢县黄山小殷洼向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负责人刘冲汇报王宗正攻打刀会，枪杀群众，及攻打滁县司令部並县府破坏团结抗战的问题。並提出由政训股配合“挺进队”攻打王宗正，占领全椒城的作战方案，得到了赞成；不久，“挺进队”进入了县城。但“挺进队”进城后对政训股掌握的武装不分敌友一律缴械，並对王永等人提出要求编为“挺进队”四支队，归还枪支弹药的合理建议一握拒绝，双方分歧严重。为了避免突然事变，王永等七人随赴延安，其余人员就地隐蔽，后绝大多数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

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秋，王永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至河南确山县工作，不久，经组织批准又一次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带病学习了一年。民国廿九年（公元1940年）春夏之交，王永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边区师范教务科任科长，一年后又调任延安二十里铺小学校长，任职期间，他与师生关系融洽。民国卅一年（公元1942年），他又奉调延属专员公署一科任科员。几年中，他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和行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国卅二年（公元1943年）7月，在延安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永因第二次赴延安途经安徽立煌（今金寨）时，曾被国民党军警拘押的历史，在康生“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被打成“叛徒”、“特务”，蒙受污辱打击，隐痛在心，不久肺病复发，导致结核性肠炎，医治无效，含冤去世。逝世后，尸骨被安葬在延安新市场对面白家坪的山坡下。王永病故后，延安行政院为他进行了“平反”，肯定他是好同志，並在他的墓地四周栽种了松柏，莫立了纪念碑。

阮 明

阮明（1889—1944），字哲符，全椒赤镇乡大阮村人，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毕业于县立全椒中学，入南京两江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学习，后东渡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法

科。回国后任全椒县劝学所所长，曾参加民国九年《全椒县志》的编修工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阮明追随李济深任机要秘书、北伐军留守处少将参议等职。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汤山后，阮明仍推荐全椒学人吴承志担任李的家庭教师。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经李济深的介绍，阮明出任浙江海盐县县长，为官清正，翌年离任，群众攀辕送别。民国廿二年（公元1933年）11月20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建成立，李济深任主席，公开反蒋，阮明改名“椒青”，参与政务。

“七七”事变后，阮明到处奔走宣传抗日，民国廿八年（公元1939年）在桂林曾手书一词勉励女青年，其中两句为：“李秀御夷晋标史册，值斯抗倭当法前烈”。民国卅二年（公元1943年）春末，阮明由大后方只身回皖，至蚌埠陈说大义，劝伪省长高冠吾叛离日汪政权，并作诗一首劝进：“眼前景物成虚幻，梦里河山似有无；不断伤心悲乱世，何甘俯首对狂奴？”离蚌后又返里进行策反活动，被日伪特务获悉。民国卅三年（公元1944年）春节后数日夜，日汪全椒县第四区区长王德安派士兵刘绍洲等人潜往大阮村，将阮明绑架杀害于距村二里许的圩埂边，终年五十五岁。牺牲后，县内各界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吊唁。

建国后，凶手王德安被人民法院判处极刑，罪恶条中即有“杀害爱国民主人士阮明”一款。阮明女儿六人均学有所专长，1983年，在美国和国内诸女奉九旬老母之命回乡扫墓，中共全椒县委统战部会同赤镇乡人民政府协助建墓立碑于殉难处。



孙 一 新

孙一新（1904—1946），曾用名孙发文，出生于古河镇叶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木工，由于祖辈贫穷没有文化，所以全家勤俭节约扶持孙一新从八岁读私塾直至二十二岁。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至民国廿六年（公元1937年）十年间，他先后在艾塘、王店、王山集、中份王、上份王任塾师，并兼做卷烟手艺。

抗战爆发后，皖东沦陷，孙一新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民国廿八年（公元1939年）初，孙一新在古河参加省三工作团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党派他到巢县黄山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不久，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孙一新服从党的决定，撤至周家岗抗日民主根据地。翌年初，他参加民运工作组到复兴集组织农民抗敌协会，征集公粮、募收捐税，为新四军筹集粮饷。6月，孙一新任复兴乡农抗理事长。不久，国民党桂系军队步步进逼，原三区实际上只剩下卧龙乡一块地方。为此，孙一新和乡指导员黄生等采取公开和隐蔽相结合的斗争方式活动，为后来坚持孤山斗争打下了基础。

民国卅年（公元1941年）底，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周家岗，县委决定成立全西工委，孙一新任委员。在坚持孤山斗争期间，孙一新还先后担任过县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等职，主要负责党的秘密工作、情报工作和交通工作。同年，中共古河区委书记司宗彝叛变，第二年底由孙一新兼任古河区委书记。孤山到古河六、七十华里的路程，完全是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孙一新经常于夜间穿越敌人的封锁区，至各乡秘密联络点搜集情报。他走过的路，哪有一堆石

头，一条水沟都了如指掌。民国卅一年（公元1942年）华中局派傅秋涛到七师任副师长，随身携带重要文件，要到无为七师师部，路西区党委将护送任务交给孙一新。孙一新接受任务后，对沿途敌情作了多次秘密侦察，最后安全地将傅秋涛送至巢县黄山七师的秘密联络点。

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孙一新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胆大心细、办事谨慎、严守秘密、有群众观念，是党员的楷模。由于孙一新有一只眼睛残废的特征，所以他在敌占区活动总是夜出晨归。一次，在一群众家过夜，正好遇到股匪抢劫，绑票抓人，孙一新组织好群众转移后已来不及撤走，被迫隐蔽在墙角的草堆中，他手持快枪，注意着土匪的动静。土匪为了抓人，竟用叉扬向草堆中乱戳，孙一新的头部被戳了一个小洞，鲜血直流。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他忍着剧痛一直坚持到土匪撤走。从此，老百姓更加爱护孙一新了，他走到哪里，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孙”！在群众的保护下，他的工作完成得更加出色。

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孙一新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他文化程度较高，有讲不完的故事，同志们都乐意跟他一起执行任务。他常常用讲故事的方式对下级进行民族主义和革命气节观的教育，提高了大家的觉悟。在司宗彝叛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被捕同志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都表现了共产党员死不叛党的英雄气概。由于孙一新革命坚决，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民国卅二年（公元1943年），他们逮捕了孙一新的胞弟孙宏文，并将其吊打致残；随后又逮捕了他的堂弟孙科文並加以杀害。为了革命，孙一新断然抛弃家业，将父母、妻儿、弟弟从古河迁至艰苦的根据地山区。

民国卅二年（公元1943年）10月，国民党桂系掀起新的反共高潮，进占了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时期，孙一新任中共全椒县委组织部长，他除继续负责古河地区地下党工作外，还负责敌工工作。当时敌工工作既复杂又危险，孙一新灵活地执行政策，在日汪占领区兴云乡建立起特别支部，争取敌乡保长和开明士绅为新四军和游击队提供情报，帮助解决粮饷和军需物资。后来，特别支部部分成员被吸收为正式党员，有的还担任了民主政府的干部。对县城日汪上层人物，孙一新也进行了分化瓦解，争取了敌工工作的主动权。

民国卅五年（公元1946年）2月，国民党又一次调集重兵侵占路西根据地，路西新四军主力和地方干部被迫“北撤”。为了坚持路西斗争，苏皖边区党委决定成立滁全县委以及和含全工委，孙一新任和含全工委书记。组织上决定让孙一新带领钟汉民到含山、巢县一带寻找地方党组织，以为定滁全支队坚持巢县黄山地区游击斗争做好准备。4月上旬，黄山地区已为国民党军队抢先占领，並进行了“清剿”，定滁全支队被迫分散活动。5月底，孙一新、钟汉民两人回到石沛桥、谭墩一带寻找定滁全县政府机关，得知已经北撤。这时，原路西根据地到处都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他们挨村逐户地登记，胁迫革命者自首。在这种情况下，孙一新、钟汉民无法藏身，曾在清水塘安基洞隐藏了数日。其时，谭墩一带离津浦路较近，如果追寻部队北撤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孙一新没有想到走，想的只是党要他留下来坚持斗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孙一新和钟汉民几经周折，来到了郭马戴村孙一新的堂弟家里隐蔽起来。为了进一步开展活动，孙一新指示钟汉民办假自首麻痹敌人，取得公开合法身份，但钟汉民自首以后便出卖了孙一新。

孙一新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妄图从孙一新的口中了解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国民政府全椒县长吴纆亲自出面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要孙一新自首，遭到孙一新严词拒绝。接着，吴纆又利用叛徒劝降，同样遭到孙一新的斥责。孙一新在敌人的“法

庭”上怒斥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盘踞古河，名为抗日实与日汪政权勾结，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孙还厉声斥责敌人的“道德法律”是“挂羊头卖狗肉”！国民党全椒县政府慑于真理和正义，对孙一新既不敢公开判决，又不敢长期关押，遂于民国卅五年（公元1946年）12月4日夜将孙一新秘密杀害于北极阁的荒坡上，并将遗体埋入干粪坑中，企图毁尸灭迹；孙一新就义时年仅四十二岁。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将孙一新的忠骨移葬，并建立碑墓供人祭扫，为了纪念他，县人民政府曾一度将石沛乡改名为“一新乡”。



金 春 祺

金春祺（1922—1949），全椒城金家巷人，建国前系国立贵州大学助教，民国卅八年（公元1949年）9月28日被国民党贵阳保安司令部暗杀于贵阳图云关。

金春祺自幼聪颖，性格倔强，富有正义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了东北三省，抗日热潮席卷祖国各地，当时，年仅九岁的金春祺就在教师的指导下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有一次，他站在凤凰街一家茶馆的大桌上宣传爱国道理，虽然童声稚气，但慷慨激昂，听者无不动容。

民国廿五年（公元1936年），金春祺十四岁，从滁县省立八中初中部毕业，考入安庆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入学不久患伤寒病被迫休学，第二年重返学校读书。同年抗战爆发，学生疏散各返原籍，冬，全椒沦陷，金春祺乃开始了流亡生活。他由皖西辗转湘赣，后闻安徽一中在皖南复校，便回皖读完高中。民国卅二年（公元1943年）毕业后，金春祺前往贵州，在贵阳任某厂化验员、市民众教育馆图书管理员工作。次年夏，考入贵州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民国卅七年（公元1948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

民国卅八年（公元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涉于崩溃，除政治上施以高压外，并在经济上对公教人员和公费学生实行克扣，停发薪金。3月26日，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贵州大学进步师生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活命”的爱国民主运动（历史上称作“三·二六事件”），金春祺的安徽籍同乡史健是这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国民党中央委员）伙同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下令逮捕史健等领导人，金春祺和他人一道出于对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情以及同乡观念，保护史健并捐款赠物护送史健脱险。贵阳保安司令部获悉此事后，于6月28日逮捕了金春祺等人。

金春祺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对他施以挟指头、锥指头、灌辣椒水及疲劳审讯等种种酷刑，但金春祺坚不吐实厉声斥责敌人。9月28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贵阳保安司令部对金春祺下了毒手。这天深夜，天气漆黑不见五指，几个特务突然打开牢门，吼叫着金的名字，叫他“马上转移！”金春祺问：“带不带行李？”回答“不带”。这时，金春祺已完全明白特务欲置己于死地了，他挺直身躯，昂起头走出了牢房。特务们将他押到图云关黔灵山下，用刺刀将他戳倒，并惨无人道地划开他的肚腹，翻肠倒脏，金春祺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金春祺等人就义后，贵州大学师生无不为之悲痛，当时贵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陈述元曾挥泪作词以抒悲愤和哀思。词中写道：“离别了年迈爹娘，来自天各一方，非刑种种苦难当。坐飞机，压双杠，石灰水，辣子酱，还有那菰藜酒给你尝，这班狗特务都是狗肺狼肝，盼只盼贵阳早解放，血债要用血来还！”1949年11月14日，贵阳解放了，贵大师生赶到金春祺遇害地点寻找他的尸骨，但已无法找到。12月2日，贵阳《新黔日报》第四版以“血海深仇”为题，报导了特务用刺刀开肚剔脏杀害金春祺的罪行。12月27日，贵州大学为了悼念学运中死难的同学，隆重地召开了追悼大会。学生会编印了《追悼特刊》，该刊第二页载有《记忆中的春祺》一文，第三页载有《金春祺先生事略》。贵大助教会与农业经济系在他被捕的寓所前立死难纪念碑，以留永念。1950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以大半版篇幅登载了何非等人的文章《血海深仇——国民党匪帮在贵阳的暴行实录》，详细报导了金春祺与其他死难者和敌人斗争及被害的事迹。

第二节 军 界

张 龢

张龢，字文懿，隋初人，祖籍山东武城，后迁居南谿（今全椒，《隋书》载：移家淮阴），他自幼苦读兵书，善骑射，精刀、盾战法。父亲张双，曾任河北清河大守，免职回南谿。一次，邑人郭子冀引南陈军队偷袭南谿，张双准备带领乡中子弟进行抗击，但不能决断，张龢自率乡人破南陈军队，自此，以勇决知名于世。

后，张龢参加北周军队屡立战功，被丞相隋国公杨坚任命为丞相府大都督，统率乡兵。贺若弼镇守寿春（今寿县西南）时，杨坚特令张龢随军监视贺的行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张龢因军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名号，赐封文安县（今河北省文安）子（爵）。一年后，率水军破笮子游叛军于京口（今镇江）、薛子建叛军于和州（今和县），调回京都（今西安市）拜为大将军。文帝赐宴接风，席间对张龢说：“卿可为朕儿，朕为卿父，今日聚集，示无外也。”宴后，又赏赐绿沉甲一付，兽纹朝服一件及绮罗千匹。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荆州和江南各地反隋割据势力进行叛乱，张龢随越国公杨素率师南下，破高智惠于会稽（今绍兴）、吴世华于临海（浙江象山港以南），晋升上大将军。后又先后担任抚（江西临川县）、济（山东茌平西南）、显（山西孝义县西）三州刺史，颇有政绩。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为行将军总管，跟随汉王谅征辽东，谅军伤亡很大，张龢的军队却很少伤亡，受到文帝的称赞。

仁寿年间（公元601—604年），调任潭州（治所今长沙市）总管，在职三年卒于任所。

平 安

平安（？—1409），乳名保儿，全椒小集乡平塘村人〔《明史》载：滁人，因明初废全

椒县入滁州，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复全椒，父亲平定从朱元璋起兵凤阳，官济宁指挥金事，后跟随常遇春荡平山东、河南，在攻克元大都（今北京）的战役中阵亡。太祖收平安为义子，袭父职，后改任密云指挥使，洪武卅一年（公元1398年）晋升右军都督金事。

朱元璋去世后，孙朱允炆继承帝位，称建文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国内爆发了争夺皇权的战争。平安拥戴朱允炆讨伐燕王，及李景隆代将，平安被提升为先锋。白沟河战役期间，战役初燕军欲抢渡白沟河（河北容城境内）向南发展，平安设骑兵一万于河边阻击，燕王说：“平安，竖子耳，往岁从（我）出塞，识我用兵，今当先破之。”当时，南军60万列阵河上，燕王率领将士驰入阵中，从早晨杀到夜晚，两军互有伤亡。第二日再战，平安击败了燕将房宽、陈亨的军队，燕王见情况紧急，亲冒箭矢率军冲杀，马乏剑折，自己也几乎被平安刺死，部将高煦赶来，才将他救出重围，北军溃败。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10月，南军主帅李景隆兵败桦山，燕军围攻济南。为解济南城围，平安驻军单家桥，意图出御河（河北宛平县玉泉）夺取燕军粮船，又选派会游水的士兵五千人偷渡黄河进攻德州，济南围解。接着与布政使铁铉共守济南，燕将朱能领兵来攻，被平安打败，平安进屯定州（今河北定县）。第二年，燕军打败南军盛庸部，回军战平安于单家桥，平安奋力率军冲杀，大破燕军，活捉燕将薛禄，燕军退走。再战涿沱河，燕军又败；平安于阵中绑木为楼，高三、四丈，战斗激烈时，即登楼指挥弓弩手射杀燕军，燕军伤亡惨重，连燕王的“帅”字旗都被射上去的箭戳得象刺猬一般。燕王派人把旗送回北平，谕示子侄不忘父辈创业之艰难。攻打藁城（今河北藁城）时，平安首先冲入敌阵，先登城头，但后援不及，始终未克该城。后南军又打北平、保定，也都劳而无功。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平安被晋升为副总兵。其时，战场上的形势已不利于南军，燕军节节南下，战事从黄河流域推移到淮河流域。萧县被燕军攻破后，平安引军紧随燕军，一直跟至浍河边，终于追上了燕将王真部，将其包围，斩杀王真。王真是燕军的一员虎将，燕王曾说：“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吃掉王真部后，燕王亲自率军来迎，平安手下将领火耳灰挺枪直刺燕王，马失前蹄被擒。平安退至小河，陈文率军赶到，平安挥师冲杀，陈文力战，金疮迸裂，被送回北平，不久身亡。此后，南军会师齐眉山与燕军大战，燕军又败。燕军诸将请求燕王退军北还，燕王不听。不久，南军何福部又到，与平安军会合，燕军更加惊慌，燕王昼夜衣不解带。

何福认为燕军远离后方，采取固守的战略，移营灵璧深堑高垒，燕王瞅准战机，乘机阻塞南军粮运，南军无粮自乱。平安见势紧急，只得分兵冲击燕军截粮部队，燕王以精骑阻击平安军，把平安军分割为二，何福开壁来援，又为高煦所败。南军无计，企图移军淮河就粮，暗约三声号炮，同时撤军。第二天，燕军中无意放炮，南军误以为是自己的号令，争相冲出营盘，队伍大乱。燕军趁势率军砍杀，南军死伤无数，何福单骑逃走，平安及陈晖等37员战将全部被俘，这一天正是阴历四月二十一日。平安长时间驻军真定（即今保定），屡败燕军，斩勇将，赶燕王，燕军将领无人敢与其争锋，被擒后，军中欢呼，争请杀平安。朱棣见局势尚未大定，为了收买人心，做出爱才惜旧的样子说：“我先皇帝（朱元璋）校养武士，今只（平）安一人耳！”派锐卒将平安护送到北平。

燕王称帝（明成祖）后，任命平安为北平都指挥使，不久又晋升为行后府都督金事。永乐

七年（公元1409年）三月，成祖巡视北京，览章奏见到平安名字，勾起旧恨说：“平保儿尚在耶？”平安知成祖不会再留他，自尽而亡。

《康熙全椒县志》记载：“今平姓已绝，惟邑西三十里高塘高皇庙里许有平家墩，古冢（墓）垒垒……。”

汪 海 洋

汪海洋（1830—1866），全椒人，民间传为全椒城西南程家市人（见1960年编《全椒广平公社史》），据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资料》说，汪原系石达开的部将，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被迫出走，海洋跟随，转战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在广西与朱衣点、彭大顺等看出石达开分裂行为的错误后，劝其回师，达开不听；遂与彭大顺、童容海等各率所部脱离石达开。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在江西遇忠王李秀成，其时，还有二十余万人。洪秀全当时正感兵力不足，深为高兴，嘉奖这支军队，命名为“扶朝天军”。汪海洋到江西后，即隶属李秀成，随其入浙江、克杭州、守余杭，军功卓著被晋封为康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8月，李秀成经营一度兴旺的江浙局面处于颓势，其时，清军已紧逼杭州，并分兵来攻余杭；担任余杭军务的汪海洋与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连营四十里：东起杭州，西迄余杭山以拒之。十一月，清闽浙总督左宗棠来余杭督战，命令将领蓝益澧、杨昌浚、黄少春领兵一万三千攻余杭城，被太平军击退；汪海洋乘夜指挥士兵挖濠筑垒，修筑工事固守。年底，大雪不止，汪海洋坚壁不动，清军见天气不利，急谋攻陷太平军五道关卡；第二日，又急攻太平军主阵地——位于余杭城北的林清堰。汪海洋得知，先伏兵于横港截击清军；清军前队深入，后军随之不能止，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清军，清军不敢再逼余杭。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二月，杭州陷落，余杭孤掌难鸣。汪海洋被迫率部弃城东走，自湖州走安徽入江西，出入广东与江西交界地区。七月，天京失陷，幼天王奔江西，汪海洋欲率部接应。十月，湖州驻军在突围走江西的途中全军溃败，洪天贵福、洪仁玕等被俘牺牲，汪海洋遂以全军隶属侍王李世贤。此时，南方太平军主要力量只剩下李世贤、汪海洋和来王陆顺得、天将丁太阳、林正扬数部。不久，李世贤攻克漳州，推行保护农商，恢复生产的政策，命汪海洋屯兵长汀、连城、上杭三地交界的南阳乡以为犄角。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正月，清将刘典攻南阳乡，与太平军战于马洋洞，汪海洋率部打败来犯之敌，追至新泉。汪海洋自率身穿黄白号衣的军队两万列阵于田间，刘典领亲兵拼死顽抗。这时，清援军赶到，太平军被迫退至西岸，过河时，淹死多人，汪海洋也几乎被俘，部下拼死救至越山。身穿黄白号衣军是汪海洋悉心训练的敢死队，危急时冲锋在前，所向无敌。

新泉遭遇战，该军损失过半；因之，放弃南阳乡走永安、至白沙，因刘典军跟至，随由坎市走龟阳，入平和。五月，李世贤部被迫撤离漳州后，一溃于永定剑滩、再溃于广东漳溪，死亡殆尽，逃向永安。相反，海洋部在这一短暂时期，军事发展却比较顺利。四月，汪海洋攻潮雷，五月入广东，首破清军于镇平，再攻嘉应州（今广东梅县），恰逢清将鲍超部

霆军哗变，由江西来到广东，海洋招抚之，兵力大增。因之，拟从广东与福建交界地还江西，遂从镇平翻越分水坳至广福乡割早稻以充军粮，为清军所阻。八月，李世贤兵败，逃至镇平依附于汪海洋，先世贤在漳州被围时，急檄汪救援，汪为保存实力借故不应，世贤兵败，汪惧罪，同时担心兵权为李所夺，刺杀了李世贤。在此之前，六月，丁太阳投降了清军；九月，陆顺得为林正扬出卖，于番禺就义；自此，驰骋闽粤、转战五岭的太平军就只剩下汪海洋率领的一支孤军了。形势如此险恶，但汪海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矢志如一，誓与清廷决战到底，至死不回。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十月，汪海洋自赣入闽，采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保存了实力。李世贤败，汪旋由上杭中都走镇平（蕉岭），活动于五岭南北，“甯江之志，百折不回”（《刘坤一遗集》奏疏）。但几次北上，途中均遭堵截，功败垂成。第二年十一月，太平军在江西龙南附近的一次激战中受挫，佑王李远继、奉王黄朋厚、扬王李明成（李秀成弟）均携眷属投降了清军席宝田部，并泄露了汪海洋拟与捻军联合作战的北上计划。不久，李远继、黄朋厚甘充内奸再度混入了汪海洋军中，汪的失败临近了。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十二月，汪海洋因数次北上被阻，为借一城“过年”，休整疲惫之师，突然由连平东走，一日疾行两百余里，乘虚攻占粤东重镇嘉应州（今梅县），大出清军所料。汪海洋占领嘉应，其意仍在寻求北进的通途，一由福建东走；二“意拟先取潮州，而后得图纷窜”（《左宗棠全集书牍·与周受三》）。但因势孤力单，清军全力围剿，汪海洋的战略计划无法实现，只得据守嘉应州城。此时，汪海洋在军事上犯了一个无可弥补的错误，他没有听从胡永祥乘敌军尚未聚集时，及早放弃州城的建议，贻误了时机。使清军主力在旬日之间“齐聚崇山峻岭之中”，占其地势之险，太平军“插翅难飞”（刘典《从戎识实》）；清军不停赶到，重重设防，嘉应州弹丸之地，失陷仅是早晚罢了。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一月，汪海洋多次率兵出城，往来倏忽，冲击围城清军，屡获胜利。清将刘典的《从戎识实》曾有一处记载：“贼踞嘉应后，连战皆捷，如某某（即鲍超）乃官兵之强者，一再被挫。”但太平军也因清军大至，先后放弃附近的村镇，收缩兵力于城内；为了坚守一月，度岁后再突围出走，太平军还扩建了土城和望楼。十六日（公历2月30日），汪海洋忽思“破釜沉舟”与围城清军决一死战，随与胡永祥、黄朋厚分三路冲出，“漫山遍野，势极披猖”，“血渍满蹊径，涧水尽赤”。湘军主力刘典全力抵挡，太平军前仆后继，英勇奋战，清军渐感不支：“我勇亦形疲倦。”（刘典《从戎识实》）。太平军在突围战中，起先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由于太平军的作战计划事先已由黄朋厚走泄给清军，刘典部虽感难以堵截，但毕竟胸有所备。刘典率部专攻汪海洋和胡永祥，而派肖雅四（原太平天国列王，降清后，被派与黄朋厚等接线者）当黄十四一路，以便逼气（刘典《从戎识实》）。刘典从叛将丁太阳处得知汪海洋每战必身先士卒的内情，命了带领清军设置枪炮侧击；当汪海洋率军冲至，丁太阳督军，“枪炮齐施，子如雨注”，海洋果然中弹，“太平军死者无败，弃尸河中，从韩江出海，自十六日流至二十日，蔽江而下，总计不下三千，二十一、二两日犹流未尽……”（转引《民国潮州府志·韩江记》）。汪海洋被士兵救回州城，因伤势过重，不幸身死。李世贤后，他是当时唯一能统辖全军的将领，他的牺牲加速了太平军余部的覆灭。